



党对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唯物史观透视

朱继胜

(广西民族大学 法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人类迄今只发明了两种组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计划经济以政府权力来组织扩大再生产,市场经济以资本力量来组织扩大再生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选择计划经济来建设中国现代化,这是党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经过资本“祛魅”与社会主义的“生成主义”阐释,党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这是党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第二个伟大成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脉相承与伟大创新的关系,统一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政府权力;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79-04

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1]这两者其实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唯物史观把历史看成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史,劳动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而劳动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生产出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产品,以维系生物意义上的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剩余劳动是超过必要劳动的部分,它生产出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蕴含着人类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潜能,因此,正是剩余劳动的发展生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本文尝试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初步的唯物史观透视,以揭示党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伟大意义。

一、计划经济: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伟大探索

(一)理性审视:计划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出于对计划经济后期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的直观感受,以及受惠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丰硕成果,于是有人怀疑,当初实行计划经济是否妨碍了中国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社会要获得发展,都必须在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力量将一部分剩余劳动投入社会再生产,以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用政府权力来处置剩余劳动、配置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对于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鉴于计划经济创始于前苏联,因此对中国与苏联一并考察,也许有助于得出更加合乎理性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与前苏联并无

不同,都是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使本国迅速强大起来,以抵御来自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压力。在人类历史上,原创性的现代化道路共有三条:第一条,由英国开辟,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实行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战略,通过利用世界市场实现现代化,铸造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第二条,由美国开创,实行“门罗主义”,保护美洲后院,及利用庞大的国内市场逐渐崛起。第三条,由德国闯出,根据李斯特的理论,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干预、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商业,进而拓展国际空间实现现代化。这其中无论哪一条道路,都是该国根据本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作出的理性选择。

前苏联因为急于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以与西方抗衡,借鉴了德国的现代化经验,通过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推进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料显示,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美国的1/8,也远远落后于英、法、德等国,但到1941年时,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法、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苏联成为除美国之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与之匹敌的超级大国,并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其崛起速度之快,堪称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由于前苏联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以及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我国“以苏为师”也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现代化。这一体制在我国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我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即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一穷二白”的国情基础上,初步建成了全国性的大工业体系,并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发展速度之快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实践证明,以政府权力配置资源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KS028)。

作者简介:朱继胜(1969-),男,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组织扩大再生产,是模仿成熟的现代大工业体系良好的经济模式。党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选择计划经济来建设中国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它不仅不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而且堪称是“一次审时度势的英明选择”,是党对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探索的伟大成果。那么,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环境”理论。

(二)历史环境:人类实践的客观前提

“历史环境”这一哲学范畴,是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的历史命运时提出来的。历史环境是“人类社会具体历史条件的总称”。^[2]在内容上,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功能上,它包括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历史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因。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个体及其社会,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3]除物质结果外,内部环境还包括精神结果。外部环境即马克思所说的“国际关系”,它是历史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外因。新中国成立之初,内部环境在“物质结果”方面表现为“一穷二白”,外部环境则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外,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制和封锁。

唯物史观认为,一国的历史环境构成了该国人民实践的客观前提,对该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不同,它的历史命运也不同。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针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更明确指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前述三条原创性的现代化之路以及前苏联之选择计划经济,正因为都是依据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出的合理选择,所以都取得了成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并不是随意而为的,最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历经风雨,进行艰苦卓绝探索的结果。

(三)哲学透视:计划经济的利与弊

在唯物史观看来,计划经济的理论思路是:从根本上消除资本,尝试不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府意志来将剩余劳动投入到生产系统,进行扩大再生产,以避免资本扩张悖论及经济危机。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经济模式对落后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结构,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资源建立起现代大工业体系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具有可预见性,同时能够避免资本之间盲目竞争所带来的高昂代价。

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有其利必有其弊。计划经济试图使整个社会经济服从于人类整体的理性安排,以克服私人资本追求自身增值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的种种弊端,制度设想十分美好,但实现条件也甚为苛刻,而这些条件并非总是能够得到满足的。因此,当现代大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就开始暴露出它的内在缺陷:

第一是动力严重不足。由于政府拥有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权力,成为组织社会生产的唯一的发动机。社会成员只能听命于政府安排,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常常动力不足。

第二是非常不利于技术创新,尤其不利于与当前技术体制相冲突的原创性、体系性的技术创新。这是因为,技术创新过程无法预先计划,而且成熟的技术体系对于新生的创新产业具有“排异性反应”,计划经济则用政府权力加强了这种排异性反应。

第三是政府在使用公权力支配社会剩余劳动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政府官员的理性能力风险,而且面临着政府官员的自身道德风险,极易产生等级制社会结构。而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不可操作的,最后必然蜕化为平均主义分配模式——简单地按劳动时间来分配。^[6]

这些缺陷表明,计划经济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在其潜力耗尽以后,接下来必然会出现社会生产效率下降。以前苏联为例,1954年至1959年,工农业生产率年均增长7.4%,已经比战后初期有所下降;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1982年时,已经下降为2.1%。人民贫困,物品匮乏,社会主义本来应有的优越性,被湮没在无处不在的政府命令中,终于导致人们对现行制度不满。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认识到,计划经济需要改革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尽头的唯一出路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均已陷入困境,危机的态势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一改革实质上要求对体制模式进行历史性转换,但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此缺乏明确认识。由于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总体框架,因而提出的“兰格模式”、“科尔奈模式”、“锡克模式”等改革理论总是落后于改革实践,致使改革以失败告终,令人为之遗憾!究其根源,在于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主义”理解;二是对市场经济的重大误解。关于这,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之手”。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优越性,必须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它能够不断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决策来配置社会资源,使社会成员争取自身利益的目的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一致,从而形成与生产力发展需要相一致的生产关系,使人社会的‘历史之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律——自动发挥作用。”^[7]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

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探索,我们党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使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据此,党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得益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二、市场经济: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伟大探索

(一)资本“祛魅”:社会主义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祛魅”一词,是借用韦伯的说法,而赋予的涵义有所不同。魅者,鬼魅也,引申理解,即人的情感,人的因素。“祛魅”的原义,是指用科学的方法把人的主观性去除,剩下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此处借用,意指将人们原先对资本的曲解、误解等等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除,还原资本的本来面目。前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紧紧捆绑在一起,根源之一在于对市场经济的内核——“资本”长期存在着重大误解。于是,在它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消灭商品、货币和资本,实行非市场化,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由于思想观念迟迟不能突破,改革理论不能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改革努力最终失败。由此可见,资本“祛魅”不啻为社会主义史上,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那么,资本究竟是什么?经过“祛魅”之后,可以看出,资本不过是“投入到生产中追求增值的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剩余价值”。^[8]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资本”(capital)并不等于“资本主义”(capitalism),正如“社会”(society)并不等于“社会主义”(socialism)一样。从“剩余价值”,到“资本”与“市场经济”,再到“资本主义”,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第一个层次:剩余价值。如前所述,马克思以其深刻的洞见,将社会劳动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必要劳动,二是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即由剩余劳动所创造。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剩余劳动,就必然存在剩余价值。在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一直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必然存在剩余价值。

第二个层次: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当剩余价值获得了某种“社会关系力量”,从而以之来配置社会资源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它就转化为“资本”;而这种“社会关系力量”,也就是“资本力量”。一个社会,如果使用资本力量来组织扩大再生产,它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资本掌握在人民的手中,由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资本力量最后为人民服务,则这样的社会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个层次:从资本到“资本主义”。一个社会,如果资本力量成为实现资本家集团利益的工具,它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进一步,如果资本家集团将资本力量扩张到经济系统以外,用于支配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支配意识形态,从而使整个社会上层建筑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9]

资本力量与政府权力,是人类迄今所发明的组织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因此,当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时,便标志着社会主义实现了资本“祛魅”,结束了社会主义各国长期以来对资本力量的恐惧与敌对的态度。

(二)社会主义:从“本质主义”阐释到“生成主义”阐释

社会主义是带着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的历史使命出场的,但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却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到“生成主义”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阐释创新的实质,是社会主义观念的更新。

依照“本质主义”阐释路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计划经济,三是按劳分配。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必须只包含这三者,而不包含它的对立面,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

而在邓小平开辟的“生成主义”阐释路径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某种具有固定性质的实体,而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的生成过程中,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根据前一种阐释,社会主义建设被视为一个实施某种理性设计方案的建构过程。这种阐释表面上非常“马列”,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1]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当然也是如此。而根据后一种阐释,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一个探索适应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生成过程,对当代中国来说,实质上是一个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对社会主义阐释在理论上突破,为党在实践上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径以及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

(三)科学发展:以社会主义力量主导资本力量

市场经济以资本力量来配置资源组织扩大再生产,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资本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如果完全听任资本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就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然会导致“资本扩张悖论”——资本扩张破坏着它进行扩张的前提条件。资本扩张悖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悖论。资本扩张以节约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为前提,但扩张的结果是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需要社会来消费,由此导致过剩性经济危机。

第二,生态悖论。资本扩张以吸收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消耗自然环境为前提,这将导致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由此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第三,人的发展悖论。资本扩张产生了使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成为整个资本增值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进而沦为“单向度的人”,严重地窒息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引发日益深刻的人的发展危机。^[12]

为了防止资本扩张悖论发生,就不能让资本力量任性而为,而必须在奉行“三个代表”的党的领导下,由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予以主导,使之成为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的工具,为此,必须实践“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用唯物史观的话语来解读,这段话包括如下几层涵义。

第一,第一要义是“发展”。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力量,包括国内资本与国际资本力量,引导、鼓励剩余价值转化为资



本,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通过“统筹兼顾”,实现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充分利用资本力量进行发展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由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科学地驾驭、导控资本力量,防止资本扩张悖论,从而解放生产力,使经济和社会都得到长期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第三,核心是“以人为本”。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是它的最高成果。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就是要求将发展的成果——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复归于人自身,由人民共享,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可见,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将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轨道来解放生产力,克服资本扩张悖论,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判断资本力量是否被纳入社会主义轨道的标准,正是邓小平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四)制度创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

要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经过资本“祛魅”与社会主义“生成主义”阐释之后,党的十四大实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制度创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以此为标志,党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究竟是何以可能的?如果依然对社会主义作“本质主义”阐释,或对资本依然存在着重大误解,当然不会存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所幸的是,经过资本“祛魅”与社会主义“生成主义”阐释之后,党正确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过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不知不觉地引导人们的利己目的,将其纳入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增进社会利益。在一定的范围内,市场实质上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之手”的自发表达机制。市场经济作为人类发明的一种配置资源的良好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如此。此其一。

其二,如前所述,单靠政府权力组织扩大再生产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只适合于模仿型的大工业体系的建设,不适合于建设需要不断进行原始创新的经济体系。在中国现代大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以后,计划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单靠政府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经济发展事实上已经不可行,必须引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利用资本力量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唯有如此,才可能创造出赶超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上述情况表明,在现代大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以后,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本身也需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才能扬长避短,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因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对于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等,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这就是“市场失灵”。同时,市场本身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构造,市场机制

需要花费巨额资源才能形成,如巨大的交易成本、过剩产品、过剩资本以及过剩劳动力等等,这本身不仅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会造成市场秩序的扭曲混乱与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个“历史之手”,仅仅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表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政府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自觉表达,才能克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点。

这就意味着,为了扬其善而抑其恶,市场经济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在奉行“三个代表”的党的领导下,由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予以驾驭和导控,才能在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下发挥功能,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三、结语:一脉相承与伟大创新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党对中国现代化的伟大探索,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阶段,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与伟大创新的关系。计划经济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历史之手”的自觉表达机制。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历史之手”的自发表达机制。无论是计划经济的“看得见的手”,还是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最终都必须服从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之手”的指引,因而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统一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旨在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践科学发展观,将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轨道,使剩余劳动最终复归于人自身,实现人民共享。它实际上是有机地结合使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来建设中国现代化,这在社会主义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正是这一制度创新,使古老的中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年均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的三倍多,十几亿人口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在中国走出了困境,而且呈现出蒸蒸日上、光辉灿烂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姚小林,徐阳鸿.马克思历史环境观初探[J].学术研究,2000,(5).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6][8][9][12]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7]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经济发展观的哲学沉思[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肖利